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构成了小说创作的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他们在创作中,努力摆脱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教诲传统模式,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与英雄叙事的传统模式;将对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于重要的位置,注重于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圣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2-0092-07

《圣经》是一部文化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经典,它不仅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的创作。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将《圣经》视为一部神圣喜剧,将其叙事结构概括为U形故事结构。[1](P220)综观一部《圣经》,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构成了这种U形故事的叙事结构。对于上帝的爱和信赖就成为这种结构的核心,在悲剧性的苦难历程中达到完满的结局,也就使《圣经》的叙事具有了喜剧性的结局。

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在对于《圣经》文本的阅读与接受中,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也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以致于影响了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小说创作的人道精神的弘扬、人物形象的塑造、宗教典故与话语的运用等方面都可见到这种影响,尤其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明显可以见到《圣经》文本对中国现代作家小说创作的启迪和影响。

—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坎坷而漫长的历史中,《圣经》的翻译是一项十分重大的工程,这不仅影响了各国的语言,而且影响着各国的文化与文学。基督教经典的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已有《圣经》的中文译述。明清之际,传教士罗明圣、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阳玛诺等先后用中文翻译过《圣经》的某些章节。18世纪末,法国传教士贺清泰首次较完

收稿日期:2002-10-18

作者简介:杨剑龙(1952-),男,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92 ·

整系统地将《圣经》译为中文。1823年,由马礼逊、米怜合译的《神天圣书》的出版为中国最早的中文《圣经》全译本。1891年底,狄考文、富善等主持了《圣经》的重译工作,于1919年初出版了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发行数以百万计。这部用汉语白话翻译的《圣经》,译文准确审慎、行文流畅上口、用语通俗明了,被视为白话文的典范。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在“五四”前的出版发行,对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必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当然也影响着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受到《圣经》文本影响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曾经受洗入教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一类是对基督教文化感兴趣的作家。前者如冰心、许地山、庐隐、苏雪林、张资平、老舍、林语堂等;后者如鲁迅、郭沫若、沈从文、萧乾、巴金等。作为基督徒、天主教徒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对《圣经》的诵读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有的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时就接受了《圣经》的影响,如冰心1914年考入美国卫理公会的贝满女中,在学校开设的《圣经》课程中成绩出类拔萃。冰心后来曾回忆说:“中学四年之中,没有什么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2](P143)庐隐在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入教,虔诚地阅读《圣经》。1922年入教的老舍曾任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不仅为基督教会起草规约,而且常常为“查经班”主讲《新约》、《旧约》等课程,甚至在抗战期间老舍还在重庆举行过《〈圣经〉与文学》的讲演,对《旧约》前五书作了详细的阐释,并论及其文学的价值。[3]出生于乡村牧师家庭的林语堂曾经在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神学院读书,假期回家常常登坛讲道。他甚至提出应该“把《圣经》当文学来读”,他认为“《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4](P20)受到基督教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不仅重视《圣经》中所蕴涵着的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深受《圣经》中文学色彩的濡染。

由于“五四”前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崇尚与引进,激起了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浓厚兴趣。在陈独秀“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的倡导中,[5]“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成为用来拯救民族的一味良药,《圣经》也就成为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案头读本。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一度“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6]后来,他还评价说:“希腊的叙事诗和剧诗,希伯来的《旧约》,印度的史诗和寓言,中国的《国风》和《楚辞》,永远是世界文学的宝库。”[7]沈从文1922年从边城来到北京,他最初的教本是《史记》、《圣经》。他说:“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悉。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本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了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8](P67)《圣经》成为了年轻的沈从文最初尝试写作的入门书籍。萧乾在教会办的崇实学校读书,“那时《圣经》要一章一章地死背,背不出来要挨罚”。[9]虽然萧乾始终未入教,但是他“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本了不起的大书”。[9]他将《旧约全书》看作“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9]巴金虽然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在他小时候就“很喜欢那本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10](P34)他在法国留学时,常常研读《圣经》,尤其熟读《四福音书》。他说:“《圣经·旧约》也对我有影响,我喜欢读《福音书》,我常常能引用其中的话。”[11](P52)

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在“五四”前后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受到了《圣经》或浓或淡的影响,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孽的存在,强调对罪孽的忏悔。在具有原罪意味的思想中,《圣经》中基督耶稣总是教诲人们要忏悔:“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人们认为:“耶稣召唤人皈依和忏悔,正如在他以前的先知,首先是针对外表的行动,如‘灰土和苦衣’、禁食和克己,二是心灵的皈依、内心的忏悔。没有此种皈依和忏悔,忏悔的行动是没有效果的,且是虚伪的;相反地,内心的皈依催促人以可见的标记、举动和悔罪的行为予以表达。”[12](P346)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以这种罪孽与忏悔的叙事模式结构小说。如庐隐的《傍晚的来客》以主人公张妈的忏悔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对于封建婚姻的针砭中托出了人物罪孽深重苦痛的内心。女佣张妈自幼与刘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却被迫嫁给了又聋又哑的张大,张妈内心仍然钟情于刘福,丈夫的妹妹松姑常常监视她的行动。五年前,为了去探望卧病的刘福,张妈将监视她的松姑推下了深井淹死,此事成为时时噬咬着张妈内心的罪孽,她常常独自忏悔她犯下的深重罪孽。庐隐的《兰田忏悔录》以忏悔录的叙事方式,叙述了主人公兰田在恋爱中的坎坷和不幸。兰田为反抗继母为她择定的婚姻而出走,到北京后与何仁相恋,却被玩弄欺骗后郁郁寡欢疾病缠身。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尽情地哭,我要想我忏悔的泪,或能洗净我对于旧礼教的耻辱,甚至于新学理的玷污。”[13](P301)庐隐常常在主人公不幸的婚恋故事的叙写中,写出人物充满着忏悔色彩的内心。

郭沫若的《落叶》以主人公菊子 41 封充满忏悔色彩的信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叙写了一个哀婉的爱情悲剧故事。基督徒菊子是日本医院的护士,与中国留学生洪师武相恋。洪师武因怀疑自己身染性病,拒绝了与菊子的往来,痛苦万分的菊子只身赴南洋隐姓埋名。洪师武“只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只想一心一意预备着消灭罪愆,完全泯灭了自己的要求”。[14](P186)菊子则在充满忏悔的信中抒发其内心的苦痛。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中的吉叔父与侄女保瑛发生了乱伦关系,怀了身孕的保瑛回乡与未婚夫匆匆完婚,却给吉叔父写信表示“对他的精神的贞操是永存的”。吉叔父迫于学校舆论的压力而离职,他想:“保瑛虽然怨我,但我误了她之一生之罪是万不能辞的。他同时又悔恨不该在自己的生涯上遗留一个拭不净的污点。”[15](P128)他带着一种忏悔的心态与保瑛告别,独自去偏僻的毛里寺岛当家庭教师。

在《圣经》文本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常常在人物的种种罪孽的描述中,让人物处于心理的矛盾与情感的波澜之中,在忏悔者的自遣自责中否定其以往的所作所为,从而摆脱精神的折磨与苦痛。忏悔者有的在对过往的否定中获得心灵的宁静,有的在精神的炼狱中走向了皈依基督之途。

《圣经》通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叙述人类始祖的堕落过程,但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人类的始祖仍然得到了上帝的拯救。有人说:“《圣经》曾谈及这些天使的罪恶。这种‘堕落’在于这些受造的精神体,以自由的抉择,彻底而无挽回地拒绝天主及他的神国。”[12](P95)正是人类的始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才走向了堕落,才面临着诸多的苦难。俄国宗教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基督教是救赎宗教,以恶和苦难的存在为前提。……基督耶稣之所以出世,就是因为世界处于恶中。所以基督教告诫,世界和人都应有自己的十字架。苦难是罪和恶的结果,但是苦难也

是脱离恶的道路。在基督教意识看来,苦难本身不一定是恶,也是神的苦难。”[16](P329)

基督耶稣以自己的牺牲与痛苦救赎堕落的世人,这也是《圣经》中叙事的一种结构与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以这种堕落与拯救的叙事模式结构小说。在一些小说中,作家常常塑造具有基督色彩的救赎者的形象,通过他们去拯救堕落了的人们。冰心《一个不重要的兵丁》中的普通士兵福和善良慈爱,常常在礼拜天去听基督教的讲道。他不满足于士兵对百姓的欺凌敲诈,他替白吃果摊上东西和白坐车的兵丁付款,他因阻拦兵丁殴打卖花生的孩子被误伤而死。福和似乎是一位以自己的牺牲救赎世人的牧者,以致于他去世后,“普遍的从长官,到他的同伴,有两三天,心灵里只是凄暗烦闷,如同羊群失去了牧人一般”。[17](P346)庐隐《余泪》中的修道院的白教师纯洁温蔼,为了劝阻上帝的儿女们不要互相残杀,只身奔赴前线“用基督的名义唤醒他们罪恶的梦”,却不幸饮弹战场。徐许《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小姐白蒂反对父亲说定的婚姻,却一反常态地酗酒、赌博,与人吵架甚至开枪打死对她非礼的男子。主人公“我”受聘医治小姐的疾病,在费尽心机努力医治小姐的疾病后,她走进了修道院“健康、平静、愉快、虔诚地在修道院里过活”。

有些小说让人物在堕落的过程中得到拯救,使他们走出堕落的渊薮。冰心《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的主人公凌瑜在社会的奋斗中受挫,烦闷悲苦至极准备投海自尽,却遇到天使般的孩童的劝慰,“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终于放弃了自尽的举动。王统照《微笑》中的恶毒美丽的女囚犯,因毒死丈夫被判终身监禁,在教会派来的医生的感化下,病愈后“性情与一切,都变化了”,“把从前所有的凶悍气概,全没有了”,成了一个微笑面对生活忍受惩罚的和美的妇人。张资平《约檀河之水》中的留学生韦先生与日本女子相恋,怀孕的她离开韦先生去东京郊外的村落居住了半年,受到基督徒女看护的影响,“她听了说教,读了圣经,才晓得自己是一个犯了罪的女子”,[15](P12)她皈依了基督获得了救赎,她劝说韦先生也走进了教堂,“上帝赦免了他从前一切的罪过”,[15](P14)作品在人物内心的苦痛中得到了救赎。

在如上的小说中,主人公要么是以基督的博爱去救赎人世,要么是恶贯满盈得到神的拯救,常常在小说中运用堕落与拯救的叙事模式结构的作品,总是让主人公处于精神苦难与矛盾的极致,然后以基督的博爱予以拯救。

基督教认为,凡是现世的人必定会承受苦难,这对于基督徒更是如此。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并不是孤独地蒙受苦难,相反,我们的最大痛苦渗透于最终实在之中。上帝既给我们带来痛苦,并且也与我们共同忍受痛苦。”[18](P73)身受苦难是必要的考验和锻炼,因此在《圣经》中描写的诸多使徒都历经磨难,这也构成了一种叙事方式:《创世纪》中的约瑟被人推入枯井、被人出卖、被人诬告、被关入囹圄;《士师记》中的耶弗他被众兄弟嫌弃离家当了土匪,甚至被迫将独生女儿献出作祭神的祭品;《约伯记》中的约伯备受折磨,大风刮倒房屋压死女儿,自己穷困潦倒病魔缠身;《约拿书》中的约拿遭遇风暴被抛入大海身陷鱼腹等等,都让他们在磨难与苦痛的经历中与苦难作斗争,在经受磨练与考验中展示他们对上帝的忠贞。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以这种受难与皈依的叙事模式结构的小说,作家常常让人物经受诸多的磨难与不幸,并不执意于表达对于人物不幸与苦难遭遇的怜悯与同情,而是让人物在坎坷与不幸的历程中走上皈依基督之路。许地山《商人妇》中的惜官因赌博破产的丈夫去南洋闯荡,一去十载音讯杳无,惜官漂洋过海寻觅丈夫,丈夫却已重新娶妻安家,甚至将惜官卖给印度商人为妾。受尽磨难的惜官在商人死后难以忍受另外几位妻子的折磨,出逃后参加了

基督教的晚祷会,在基督的关爱下得到了慰藉。许地山《玉官》中的玉官含辛茹苦守寡将儿子拉扯大,企望儿子今后出人头地为她竖一座贞节牌坊。留学归来的儿子却未给其母立牌坊,玉官走进了教堂皈依了基督。她努力为爱而传教,“她觉得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她现在知道不计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19](P365)苏雪林《棘心》中的主人公杜醒秋到法国留学,深受疾病的磨难,又在个人感情与家庭生活中遇到诸多刺激:家乡遭匪祸母亲受伤加惊恐而重病缠身、在美国留学的男友又十分冷淡。遭受着身心苦痛的杜醒秋在万般无奈中,“她的灵魂已到走投无路的地步,除了倚靠神力之外,也没有别的力量可靠”,[20](P168)她皈依了天主。徐汙《时与光》中的郑乃顿在失恋后,成为了一个偶然论者,将人生的一切都看作是偶然的,否定爱情、否定人生,玩世不恭随遇而安。他到香港后在林明默和罗素蕾两个女子之间周旋,深受感情的折磨,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从内心深处皈依了基督。

在如上的小说中,作家都以主人公的受难构成作品的重要内容,以主人公的皈依基督成为作品的结局,构成了小说受难与皈依的叙事模式。

三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濡染与影响,作为充满着艺术光彩的文学文本的《圣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使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在摆脱中国古典小说的束缚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迈进了一大步。

受《圣经》文本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的叙事中努力摆脱了中国古典小说伦理教诲的传统模式,而将对于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于重要的地位。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制约与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往往被束缚在一种伦理教诲的叙事模式中,无论是唐传奇的“或谈讽喻以抒牢愁,或谈祸福以寓惩劝”,[21](P123)还是宋话本的“为士大夫家用为感化顽劣儿童的一种教育方法”;[21](P191)无论是明代的言情小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22](P199)还是清代讽刺小说“戚而能谐,婉而多讽”,[22](P247)都有着一种劝善惩恶的叙事模式,都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观照与规范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中国古典小说或弘扬小说中人物的善举,或针砭小说中人物的恶行,儒家的忠与孝成为衡量小说中人物行为举止的标准,而忽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忽视对于个体的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受到《圣经》文本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伦理教诲的叙事模式,而将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使小说在打破传统伦理教诲的叙事模式中,具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

受《圣经》文本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的叙事中努力摆脱了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而更加注重对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中国传统小说大都采取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或在儒家礼教的规范下注重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强调和谐中庸,或在老庄精神的影响下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突出天人合一。小说的叙事大都是注重对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而较少去挖掘或展示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在心灵。无论是唐传奇《柳毅传》描写落第书生柳毅与龙女的情爱,还是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与秀秀的鬼魂同居;无论是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婚外恋情,还是清代小说《红楼梦》

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悲剧故事,作家大都将笔墨置于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的描写中,大都在人物与外部世界的纠葛与矛盾中叙写情节、刻画人物,而较少地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着力袒露人物心理的复杂与矛盾。受到《圣经》文本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诸多小说的叙述中,常常努力深入人物心灵的深处,袒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苦痛。无论是庐隐的《兰田忏悔录》、《余泪》,还是郭沫若的《落叶》、《漂流三部曲》;无论是许地山的《商人妇》、《玉官》,还是徐訏的《时与光》、《彼岸》,都将对人物心理、心态的剖露与袒现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中,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得特别丰富和生动。

受到《圣经》文本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的叙事中努力摆脱了英雄叙事的传统模式,而更加注重对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君臣父子森严的伦理等级的制约规范下,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常常注重于英雄叙事,而忽略对平民生活的关注。无论是《三国演义》对于魏蜀汉三国争斗的描写,还是《水浒传》对于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的叙述;无论是《西游记》对于勇斗妖魔西天取经经历的描写,还是《儒林外史》对于众多儒林人士的揭露讽刺,在总体上都是以英雄叙事的模式展开叙写的。无论是对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叙事结局的展示,还是对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的推崇,都使中国传统小说充满了英雄的气息。基督教文化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上帝子民的平等互助,除了人与上帝的区别以外,人们无论贫富智愚都是一律平等的。在基督教文化的濡染下,在《圣经》文本的影响下,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在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中,将对普通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置于重要的地位。许地山小说对惜官、玉官这些普通妇女遭遇的描写;冰心小说对福和、凌瑜这些平民百姓人生的勾画;庐隐作品对于张妈、兰田等不幸人们生活的关注;郭沫若小说对留学生、基督徒人生的描写,都没有丝毫的英雄色彩,有的只是平凡普通人生的磨难与坎坷,面对坎坷人生的挣扎与寻觅。

在世界小说艺术发展的轨迹中,从文艺复兴对人文主义的呼唤,到启蒙主义运动对哲理小说的推崇;从19世纪初期对于浪漫主义的倡导,到19世纪中期对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提倡,进入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使文学迅速步入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刘纲纪在谈到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的发展时说:“……我认为我们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可以借鉴的东西是它对人作为个体感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重视,以及它用以描绘、表现现代人的心理、欲求、处境,与20世纪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人们的审美要求相适应的某些形式、手法。”[23](P3)受到《圣经》文本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采取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将对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于重要的地位,更加注重对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更加注重对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虽然小说的叙事存在着叙事的简单化、结构的雷同性等不足,但是这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靠近了世界小说创作发展的潮流,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摆脱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叙事模式中,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 [1]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 郝振益,樊振帼,何成洲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范伯群. 冰心研究资料[Z].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3] 萧伯青. 老舍在武汉重庆[J]. 新文学史料,1986,(2).

- [4]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A].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5]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J].新青年,1920,7(3).
- [6] 郭沫若.泰戈尔来华之我见[J].创造周报,1923-10-14(23号).
- [7] 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N].新华日报,1944-04-16(3).
- [8]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A].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 [9] 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J].新文学史料,1991,(1).
- [10] 巴金.家庭的环境[A].巴金.忆[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 [11] 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M].上海:上海书店,1986.
- [12] 天主教教理[Z].天津:河北天主教信德室,2000.
- [13] 庐隐.庐隐选集(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14] 郭沫若文集:5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15] 李葆炎.张资平小说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 [16] 别尔嘉耶夫.恶与赎[A].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17] 冰心文集:第1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 [18] 查尔斯·L·坎默.基督教伦理学[M].王苏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19] 许地山小说全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 [20] 苏雪林文集:第1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21]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4.
- [2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23] 刘纲纪.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序[A].罗国祥.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贺秀明]

Narrative Pattern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the Version of the Bible

YANG Jian-long

Abstract: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culture man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re tainted by the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their creative fiction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he narrative patterns of sin and confession, sinking and saving, suffering and conversion can be often seen in their fiction. They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ethical teaching, the person's outlook i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heroic narr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They have highlighted the thinking of human's situation and way out, paid attention to exposing and revealing human's inner world and taking care of the common people. All these have helped the narration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take a big stride toward th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fiction, pattern of narrative, the Bible